

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

Zhongguo Nongmingong Zhengzhi Canyu Yanjiu

高洪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

Zhongguo Nongmingong Zhengzhi Canyu Yanjiu

高洪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 / 高洪贵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161 - 6149 - 4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民工 - 参与管理 - 研究 - 中国
IV. ①D42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703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金 萍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08CZZ001）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一般项目“中国转型时期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成果，同时得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行政学、政治学省级领军人才梯队的出版资助。

序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事关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意义非凡。中国目前有2亿多农民工，这个群体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渐趋壮大的。他们进城务工的历史进程，不仅仅是经济收入增长和视野开阔的历史，更是政治权利改善和利益表达渠道拓宽的历史。农民工作为日益成长的新兴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城市和农村繁荣进步的中流砥柱。但是他们对中国公共生活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呈现出经济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不平衡现象。农民工群体所享有的政治资源相当匮乏，他们的政治诉求无法及时有效地成为公共议题，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表演性质的行动表达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从中展示作为“弱者的武器”的现实力量。

实际上，政治话语权的缺乏是该群体在经济生活中价值创造与收益失衡的原因之一，其所谓的经济影响力也仅限于被动的推动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并没有关涉自身福祉的话语权。具体到政治参与问题上，农民工群体长期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实际是处于政治排斥状态之中，这对于农民工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生活的改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政治文明推进都具有阻碍作用。现代政治追求在共同体所有成员中实现权利的平等和利益的公平分配。从社会成员角度讲，农民工平等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是改善和增进其经济生活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其政治地位与公民身份的应有肯定和尊重。从国家层面而言，长期无视某一社会群体的政治权益既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在现实中也难免承担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如果中国的2亿多农民工在政治领域出现集体失语，无疑将对和谐社会建设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潜在的巨大影响。农民工目前的政治参与状况处于比较特殊的境地，虽然制度内通道已经

逐步形成,但农民工真正在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比例不高。相反,党和政府政策法规禁止的非制度化参与案例却层出不穷。

本书作者认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划定了其政治参与的基本界限。农民工民主权利的真正享有、其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是和政治参与制度环境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的。在我国,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协商制度、公共听证制度、信访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参与制度与农民工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不相适应,存在着制度空置的缺陷。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渠道因其缺少保障机制而流于表面化。在今天这种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进程中,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是各级政府永恒不变的主题。只要不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不发生大量农民工聚集式的群体性事件,政府不会关注保障农民工民主权利的表达和机制完善问题。这就造成了参与性制度虽然存在,并在宏观领域内为农民工政治参与搭建了平台,但却没能使大多数农民工在这种制度环境内自由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本书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和对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表明,从农民工的政治常识和政治态度方面讲,农民工对于国际国内的基本政治知识掌握相对缺乏,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训练,缺少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平台。同时,农民工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活动的价值认知相对模糊,政治关心呈现喜忧参半的特征,他们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偏弱,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较高。也是研究制定农民工参与政治战略的关键所在。选举是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选举型政治参与呈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双重边缘性。不参与选举的理由是:没机会、没资格、没时间、没经济实力、没兴趣,这些都使这个群体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基本权利在无形中丧失。在农民工有限的政治参与行为中,政治参与的功利性、不均衡性,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等特点也比较明显。由于制度环境设计的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受阻,他们又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需要利益表达进而影响政策过程及结果的强烈需求。这种政治参与需求与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错位,造成了农民工在体制外寻求出路的局面。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农民工善于利用日益完备的信息资源,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多的是以非制度化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

而影响政策出台的过程。在阶层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农民工权益遭受严重损害的事件比比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就是一个明证。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容易与违法犯罪的暴力活动相互关联与相互渗透,其对政治稳定和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及参与形式,一般受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具体国情的制约。一般认为,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政治机制、公民个体的行为偏好等方面。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之下,农民工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政治领域中也迫切要求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随着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对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对自身拥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公民在国家政策制定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农民工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增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是否能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成为衡量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总体上看,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政治参与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有了参与的可能性和制度安排。制度机制、组织化程度、参与成本、参与主体的素质能力、政府作为情况等多种因素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指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民工通过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影响政府的政策过程,表达自身的政治权利愿望与要求,减少政府的政策失误,使政府运行整个过程与“公意”相一致。这有利于保持政治过程合法性和有序性。具体而言,这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又能提升农民工政治素质,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还能推动我国公共决策民主化合法化过程,促进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在如何有效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方面,本书作者提出以下观点:一是要树立公民本位的精神,并从制度安排入手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及政治参与问题,只有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才具有解决的可能性空间。二是改革和创新农民工政治参与

制度机制，拓展参与渠道。三是政府大力培育农民工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工自组织能力，以实现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协商民主，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素质教育，如文化教育、法律教育、政治技能教育、民主意识教育等，以增强农民工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

作者高洪贵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他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作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品学兼优，为人真诚，勤奋好学，学风朴实，研究基础扎实，攻读博士期间就已发表近十篇相关成果，他的博士论文也收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我对他的学术生涯抱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我十分愿意为本书作序。同时，作者研究方向与我的研究领域比较接近，政治发展和公民政治参与密不可分，农民工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已经显现，本书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言而喻。作者在广泛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自身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初步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构架，形成了一家之言，书中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能够继续关注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在本研究领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为序。

王彩波

2014年7月15日于吉林大学

目 录

导论	(1)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一) 国外研究现状	(3)
(二) 国内研究现状	(6)
三 论证思路和基本构架	(11)
四 本研究核心概念界定	(13)
(一) 政治参与	(13)
(二) 农民工	(17)
(三) 农民工政治参与	(20)
五 研究方法及不足之处	(20)
(一) 研究方法	(20)
(二) 不足之处	(21)
第一章 中国农民工的基本状况分析	(22)
一 农民工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	(22)
(一)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工流动	(22)
(二) 转型期中国农民工的总体特征及发展趋势	(26)
二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功能与处境	(29)
(一) 社会功能	(30)
(二) 社会处境	(32)
三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意义和价值	(36)
(一) 公平正义: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价值导向	(37)
(二) 和谐稳定: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生态功能	(38)
(三) 权利保障: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本质体现	(40)
(四) 政治发展: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追求	(42)
(五) 素质提升: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美好愿景	(43)

(六) 政策合法性: 农民政治参与的民主内核	(45)
(七) 城乡统筹: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关怀	(48)
第二章 从边缘化到“弱者的武器”: 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	
考察	(50)
一 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	(50)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51)
(二) 协商民主制度	(53)
(三) 公共听证制度	(56)
(四) 信访制度	(58)
(五) 基层自治制度	(61)
二 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65)
(一) 选举	(66)
(二) 投票	(67)
(三) 会议沟通	(68)
(四) 媒体投诉	(68)
(五) 诉讼	(69)
(六) 组织参与	(69)
(七) 政治接触	(70)
(八) 非制度化参与	(71)
三 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特征	(72)
(一) 农民工政治认知	(74)
(二) 农民工政治参与态度	(76)
(三) 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	(80)
四 网络环境下农民工政治参与新动向——以农民工	
“创意讨薪”为例	(92)
(一) “创意讨薪”: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底层方式	(93)
(二) 作为弱者的武器: 农民工底层政治参与的生成逻辑	(96)
第三章 从行为偏好到制度约束: 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阻碍因素	
分析	(101)
一 户籍制度及政治参与制度不完善	(102)
(一) 户籍制度的影响	(102)
(二) 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不完善	(103)
二 教育培训滞后	(105)
(一) 政府对农民工职业培训保障机制不完善	(106)
(二) 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和方式滞后	(107)

(三) 农民工自身受经济水平、主观意向等因素导致的 障碍	(107)
三 文化排斥	(109)
(一) “外地人”标签与文化排斥	(109)
(二) 传统行政文化限制	(110)
四 政府失位	(111)
(一) 地方政府体制性迟钝	(111)
(二) 地方政府利益协调动力不足	(112)
(三) 地方政府的垄断型思维	(113)
五 农民工利益代表机制缺失	(114)
(一) 农民工利益代表机制不足	(114)
(二) 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不足	(116)
六 政治参与成本及信息不对称	(118)
(一) 政治参与成本的功利性考量	(118)
(二) 政治参与相关信息不对称	(119)
第四章 从制度完善到赋权保障：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 路径	(121)
一 政府应确立公民本位的价值导向	(123)
(一) 确立公民权利为核心的价值导向	(123)
(二) 将以人为本理念贯穿于农民工工作始终	(124)
二 完善农民工社会融入制度	(125)
(一)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125)
(二) 建立城乡平等的劳动就业平台	(126)
(三) 设立农民工专业管理机构	(127)
(四) 营造平等、和谐和宽容的文化	(127)
(五) 完善政府公共服务	(128)
三 健全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	(128)
(一)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29)
(二) 完善政治协商制度	(130)
(三) 健全农民工社区政治参与的保障制度	(131)
(四) 构建行政协商制度	(132)
四 培育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	(133)
(一) 培育农民工社会组织	(134)
(二) 健全和完善社团组织管理体制	(135)
五 强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	(136)

(一) 加强农民工的素质教育是提高其政治参与质量的重要步骤	(136)
(二)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	(137)
(三) 提高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农民工教育培训服务的质量	(140)
六 构建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	(152)
(一) 加快党务政务公开的法制化建设步伐	(153)
(二) 建立多样化的信息沟通渠道	(154)
七 构建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的预防化解机制	(155)
(一) 构建科学的预警机制	(155)
(二) 构建新型的社会整合机制	(156)
(三) 构建完备的依法处置机制	(157)
结语	(159)
附录	(163)
附录一 农民工政治参与问卷统计表	(163)
附录二 返乡农民工政治参与问卷统计表	(171)
附录三 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个案访谈提纲	(178)
参考文献	(180)
后记	(196)

导 论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紧密相连，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题中之意。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事关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意义非凡。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民工，这个群体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渐趋壮大的。他们进城务工的历史进程，不仅仅是经济收入增长和视野开阔的历史，更是政治权利改善和利益表达渠道拓宽的历史。农民工作为我国日益成长的新兴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是城市和农村繁荣进步的中流砥柱。但他们对我国公共生活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呈现出经济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不平衡现象。农民工群体所享有的政治资源相当匮乏，他们的政治诉求无法及时有效地成为公共议题。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表演性质的行动表达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从中展示作为弱者的武器的现实力量。实际上，政治话语权的缺乏是造成该群体在经济生活中，价值创造与收益失衡的原因之一。因此，所谓的经济影响力也仅限于被动地推动着我国经济向前，而并没有关涉自身福祉的话语权。具体到政治参与问题上，农民工群体长期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实际上处于政治排斥状态之中，这对于农民工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生活的改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政治文明推进都具有阻碍作用。现代政治追求在共同体所有成员中实现权利的平等与利益的分配正义。从社会成员角度讲，农民工平等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是改善和增进经济生活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其政治地位与公民身份的应有肯定和尊重。从国家角度而言，长期无视某一社会群体的政治权益，既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现实中又不免承担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如果我

国的2亿多农民工在政治领域出现集体失语,无疑将对社会秩序形成潜在的巨大影响。农民工目前的政治参与状况处于比较特殊的境地。有序的政治参与制度内通道虽然并不少见,但农民工真正进行政治参与比例不高。相反,党和政府政策法规禁止的非制度化参与案例却层出不穷。

高效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是维系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和衡量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尺度。作为一支特殊而重要的社会力量,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参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广度与深度。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是中国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重要变量。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工的处境比较艰难,经济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更是难以有效表达。随着党和政府对农民工权益日益重视,农民工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工参与公共生活问题日益浮出水面。总体而言,当下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仍比较低,大多数农民工在政治参与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谈不上真正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这种状况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工自身缺乏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缺乏针对这一群体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与机制保障。本书试图在把握中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和参与现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影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因素,力图给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途径。

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成果颇多,但大多集中于经济学或社会学领域。从政治学视角,尤其是从政治参与角度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并不多。作为当代中国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改变不合理的外在制度约束,以制度创新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中被边缘化与政治排斥问题,使受过现代文明熏陶,具有现代意识的亿万农民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生力军,是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因此,从协商民主理论、政府责任、抗争政治等视角了解中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与参与现状、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对于正确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状态,科学理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我国农民工的研究比较有限。因国外没有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加之信息资源有限，对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二元经济形态并存：即以古老村落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先进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最终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通过对两部门模型分析，刘易斯得出如下结论：发展中国家农村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接近于零）的过剩劳动力，而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与现代部门（如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导致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现代工业部门，即所谓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中国社会无疑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但是，中国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却更为复杂，因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一系列特殊制度安排的产物，如户籍制度等，农民工这一独特社会群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基于此，拉尼斯·费景汉发展了刘易斯的模式，他认为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平衡增长之路，工农业的发展会使劳动力顺利转移。同时，他也认识到人口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影响，一个地区的人口如增长过快，将使得其难以达到经济起飞所需的“临界最小努力”，劳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移。还有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城乡边际人问题，但他们更注重对边际人人格与内心体验的矛盾及其原因的分析，而没有更多关注其对社会的影响。近些年，国外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多，与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有些关联的成果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及影响因素。M. 莫列尔－法兹奥（M. Maurer－Fazio）等学者对我国 120 家企业的农民工与城市职工进行了对

比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比城市职工高,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其重新选择工作的信心比城市职工充足。M. C. 希伯尔格(M. C. Seeborg)(2000)通过对中国城乡移民原因研究发现: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劳动力。他认为单一的新古典模型对中国移民原因的解释力已经有所不足,应当吸取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补充新古典模型的解释。A. 德日甘鲁(A. De Zhigang Lu)(2006)研究我国城乡移民的工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不同的制度根源。解决的办法是应当废除户籍制度。^①

2. 关于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分析构架问题。美国学者费尔德曼与中国学者悦中山、李树茁合著的《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一书,首先界定了“社会融合”的概念,利用移民网络的分析视角,建立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本土性的、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出台提出相关建议。“国内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与国际移民所处的背景有极大差异。但农民工与国际移民在流入地的弱势地位是相似的,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他们在社会融合过程中面临许多类似的困难罗勃茨(Roberts, 1997)”^②

3. 关于中国农民工社会功能与价值的探讨。爱尔兰学者瑞雪·墨菲在著作《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中,通过对江西省万载县、信丰县和于都县深度田野调查,认为行动者、价值、目标和资源的互动与反馈对乡村社会的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工通过城市务工开阔了视野,并获得乡村社会不具备的新的资源,返乡时容易受到流出地居民的尊重,并且形成正向激励,形成习俗,从而带动其他人参与其中。^③ 怀特·马丁·

① 赵俊超、平新乔:《国外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8期,第104—107页。

② 悦中山、李树茁、[美]费尔德曼:《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③ [爱尔兰]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黄涛、王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金 (White Martin King) (1999) 认为: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减少了, 工人阶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工人阶级并没有平静地接受地位的衰落, 劳资冲突时显紧张, 工人的抱怨、集体请愿、罢工、阴谋破坏乃至对管理层的人身暴力近年来频频发生。国家虽然颁布了保护工人阶级权益的法律, 但是法律执行的效果欠佳, 工人阶级缺少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不满。”^①

4. 关于中国农民工公共服务与公民权的研究。在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中, 苏黛瑞的著作《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比较有代表性。这本书曾经获得过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 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该书对于流动人口城市遭到的公共产品与城市居民文化歧视等不利处境进行阐释, 揭示了农民工权利抗争及制度转型时代的公民权和市场逻辑。^② 另外, 翟梁 (Zai Liang) 和由伯陈 (Yiu Por Chen) (2007) 对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均等化是农民工及城市教育决策者面临的重要问题。“除了以上这些研究, 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对城乡移民的其他影响进行了研究, 如春冲敖 (Chun - Chung Au) 和 J. V. 亨德森 (J. V. Henderson) (2006) 指出, 由于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人口制度, 对城乡移民进行严格限制, 导致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达不到规模经济所需的最低规模要求; E. 莫波兰德 (E. Mobernd) (2006) 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城乡移民和国外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 认为中国城乡移民由于不像拉美国家那样组成社团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对住房、公共安全和服务的获取, 因此他们在城市里难以得到公共服务, 他们被捆绑在原始居住区, 被地方当局看作汇款来源而加以鼓励, 这种地域特

① 赵俊超、平新乔:《国外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8期,第104—107页。

② [美] 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单丽卿译,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